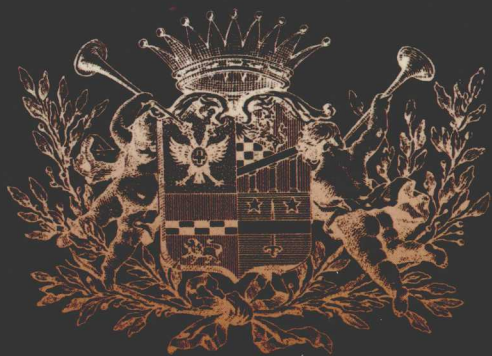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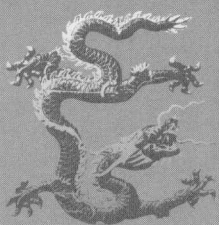
碰撞、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 的轨迹和特点

马骏骐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zhongwaiwenhuajiaoliudeguijihete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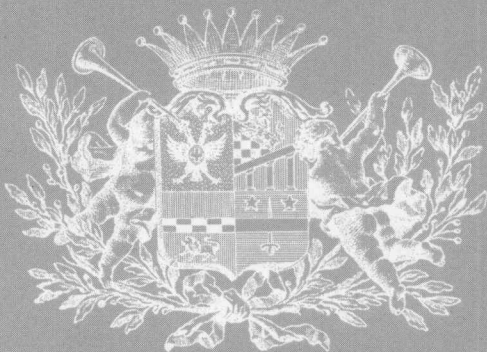
wenhua

马骏骥/著

碰撞、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
的轨迹和特点

pengzhuang
jiaorong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与特点/马骏琪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4

ISBN 7-221-07336-8

I. 碰... II. 马... III. 文化交流—中外关系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06)第034499号

责任编辑:钱 治

装帧设计:曹琼德

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与特点

马骏琪 著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师大印刷厂

开 本:1/16 787×1092mm

印 张:23.625

字 数:330(千字)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1-07336-8/G·2426

定 价:38.00元

目 录

目 录

| | |
|----------------------------|-------|
| 第一章 中外文化交流的曙光时代 | (001) |
| 一 中外交往的肇始 | (001) |
| (一) 中国文化的起源 | (001) |
| (二) 夏商周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003) |
| 二 先秦时期中外交通寻踪 | (006) |
| 三 远古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 (010) |
|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 (013) |
| 一 汉代的对外交通 | (013) |
| (一) 张骞“凿空”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 (014) |
|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形式 | (017) |
| (三) 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甘英出使大秦 | (020) |
| 二、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 | (023) |
| (一) 佛教东传的社会历史条件 | (023) |
| (二) 佛教初传汉地 | (025) |
| (三) 西域高僧东来与佛经翻译 | (027) |
| 三 两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030) |
| (一) 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 (030) |
| (二) 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 | (032) |

| | |
|---------------------------------|--------------|
| (三) 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 | (034)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037)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陆海交通 | (037) |
| (一) 陆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 (038) |
|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日趋兴起 | (039) |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 | (042) |
| (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 | (042) |
| (二)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激相荡 | (046) |
| (三)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 (048) |
|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051) |
| (一) 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 | (052) |
| (二)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 (054) |
| 第四章 唐宋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059) |
| 一 唐代对外陆海路交通的拓展与变化 | (059) |
| (一) 唐代西域与陆上丝绸之路 | (060) |
| (二)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与发展 | (063) |
| 二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 (068) |
| (一) 唐代中外人员的交往 | (068) |
| (二) 唐代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 (070) |
| (三) 西亚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 (075) |
| (四) 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 | (079) |
| (五)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 (084) |
| 三 宋代中外陆海交通的兴衰更替 | (092) |
| (一) 宋代与西域的交通 | (092) |
| (二) 宋代海外交通的繁盛 | (095) |
| 四 宋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 (100) |
| (一) 中国陶瓷文化的西传 | (100) |
| (二) 指南针与印刷术等中国科技的西传 | (103) |

| | |
|---------------------------------|--------------|
| (三)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 (109) |
| 第五章 蒙元至明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115) |
| 一 蒙古的西征与对外陆海交通 | (115) |
| 二 蒙古帝国与西欧的交往 | (124) |
| 三 蒙元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134) |
| (一) 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 (134) |
| (二) 蒙元时期的移民与外来宗教 | (138) |
| (三) 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 | (144) |
| (四)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 (151) |
| 四 明前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155) |
| (一) 明初与东亚诸国的关系与文化交流 | (155) |
| (二) 明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与文化交流 | (158) |
| (三) 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文化交流 | (165) |
| 五 先秦至明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 (172) |
| 第六章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调适与会通 | (184) |
| 一 中西文化调适与会通的背景 | (184) |
| (一)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 | (185) |
| (二)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 (188) |
| (三) 明末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 | (190) |
| 二 基督教东传的第三次浪潮 | (194) |
| (一) 耶稣会士在华的早期活动 | (194) |
| (二) 利玛窦等在华的传教活动 | (199) |
| 三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 (208) |
| (一) 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的输入 | (210) |
| (二) 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与历法改革 | (213) |
| (三) 西方数学的引进与传播 | (217) |
| (四) 西方火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传入 | (219) |
| (五) 西方生物学与医学的输入 | (222) |

| | |
|-------------------------------|--------------|
| (六) 西方语言学、音乐、美术和建筑术的输入 | (224) |
| 四 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影响 | (229) |
| (一) 儒家经典的译介与中国语言的研究 | (229) |
| (二) 中国史地与科学的西传 | (232) |
| (三) 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 | (237) |
| (四) 拉丁文明时代欧洲的“中国热” | (242) |
| 五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断落 | (247) |
| 六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 (253)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 (264) |
| 一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 (265) |
| (一) 鸦片战争迨至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266) |
| (二) 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276) |
| (三) 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285) |
| 二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 (291) |
| (一) 译书、著书、创办报刊 | (291) |
| (二) 遣使西洋,常驻外国 | (326) |
| (三) 遴选学子,负笈海外 | (335) |
| (四) 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 | (345) |
| 三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 (355) |
| 主要参考文献 | (366) |
| 后 记 | (371) |

第一章

中外文化交流的曙光时代

在人类文明肇始的朝霞时代,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横空出世,各呈异彩,嘉惠人类文明的发展。上述古代文明自勃兴之后,便自然地、波浪式地向外拓展,影响各自的周邻地区且日渐远播。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华文明自然而然地与其他异质的古代文明发生了接触,彼此影响,相互吮吸,从而迎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曙光。

一 中外交往的肇始

远古以来,生活、劳作、繁衍在东亚大陆广袤土地上的华夏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具特质的中国文化。神州大地,乃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自中华文明诞生以后,便与其他古代文明有了交往与联系,故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一) 中国文化的起源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民族性、地域性、国度性是文化

的重要属性。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发源地,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中华”一词之“中”,意即居四方之中;“华”,原意为辉煌、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先进发达之意。元儒士王元亮则进一步对“中华”一词作了诠释:“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①

就中国文化的起源而言,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文化便有其一脉相承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迄今,我国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约二百余处,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时代的各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则更为繁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发现七千余处,已发掘四百余处。经考古工作者精确的年代测定与严谨的类型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的年代序列关系得到了梳理与明确。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土生土长的一种新石器文化,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系统分明,其地理分布是:以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豫西沿河各地为中心,东至豫东、冀南,西及陇西,南达鄂西北,北越河套。经碳14测定,仰韶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延续两千年之久。

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及其毗邻地区得到了滋生与繁荣,其传播路径呈由东而西的趋向。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天水大地湾、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是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则介于仰韶文化与甘肃的马家窑文化之间,系仰韶文化过渡期。山东龙山文化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是其东支。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则是中原仰韶文化的西支,其西传经由甘肃、宁夏至新疆西部的于阕、皮山、沙雅及伊犁河流域。而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之后、商周文化之前的彩陶文化,深受仰韶彩陶文化的影响。翔实的考古材料证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

^① 王元亮:《唐律疏义释文》。

1973年,在长江流域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迄今江南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经碳14测定,距今约七千年。此外,在长江下游地区还相继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而长江中游地区则发现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上述文化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联系密切。与此同时,仰韶文化对北方内蒙古赤峰一带的红山文化影响明显。新石器时代,我国各种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从而交织成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旋律的文化色彩,孕育了中国文明的胚胎。所以,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中国本土并独具风采的文化。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丰硕成就雄辩地证明,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显然是谬说。中国文化一经形成,便不断与域外发生接触、交往,日久天长,这种交往与联系自然愈加明显、密切。

(二) 夏商周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我国历史正式迈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夏朝建政后与域外的交往,文献资料鲜有载述。然而,豫西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则提供了夏朝与域外交往的信息。

在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器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环首柄刀和器身类似北方战斧而以扁平的“内”代替管釜方的奇特武器。^①这些出土的青铜武器呈北方系青铜器的特色,故称:“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青铜器。”由于北方系青铜器既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也分布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故国外考古界亦称为“中国——西伯利亚”类型青铜器。出土的早期北方系青铜武器主要有青铜短剑、管釜战斧、连铸的短柄青铜刀,器上多附有环或小形钮,以便悬挂,彰显出游牧文化的特色。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武器表明,当时我国北方地区与西

^① 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伯利亚等地区青铜文化的交往联系密切。

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建政,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大国。有商一代,青铜冶炼技术,青铜器制造工艺高度发展,其生产规模之大,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罕见的。在商代青铜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殷商人曾采择、引进了北方系青铜器的一些合理因素,对中原传统的戈、钺、刀等青铜武器进行了改进。所以,在殷商文化的大司空村二期遗址中,出土了新式的内戈釜、内钺和环首柄刀。与此同时,商青铜文化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邻地区扩散,叶尼塞河流域和卡拉苏克文化就深受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其出土的青铜小刀、两头弯曲中间平直的弓形器,均酷似安阳的发掘物,出土的青铜矛和铜簇亦和商代的两种铜矛相似。^①而且,外贝加尔地区与蒙古的出土物均属于卡拉苏克文化晚期,卡拉苏克文化的凹格短剑,塔加尔文化(公元前800~前100年)的兽形柄顶短剑、十字形柄顶短剑,均与我国两周时期流行于中原与北方地区的柳叶剑相似。殷商时期,中外之间的往来明显反映在青铜文化的交流上,而游牧民的迁徙,移民的流动,则是青铜文化交流的纽带与媒介。早在夏代,处于中国北方的荤粥,外贝加尔湖和米努斯克地区的居民就与我国黄河流域有了往来。居于贝加尔湖的丁零(即“狄历”)民族,夏代时亦曾“会于中国”。殷商建政后,便与北方的荤粥、鬼方(汉代称先零羌,即羌族。)有了交往。据《商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时四方民族前来朝献,北方、西方共有十余个民族,鬼方亦在其中。殷商青铜文化在向北方地区传播过程中,鬼方、荤粥等游牧民族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殷商时,在与北方地区游牧民的交往中,居于今陕西岐山县境内的周族,率先输入了骑马文化。故《诗·大雅·绵》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说。引文中的“古公亶父”,即为周朝的缔造者姬发的曾祖父。所谓“走马”,即为单骑。于是,骑马术遂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殷商。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灭商建政，周朝与西北地区游牧部落的联系得到加强，迨至周穆王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犬戎势力在西北地区的崛起，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地区游牧部落的往来，于是穆王率六师西征犬戎，“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遂开始了向西巡狩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旅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载述了穆王向西巡狩的过程，其记述曾被《竹书纪年》、《史记》所采录。

关于周穆王西巡路线，按沈福伟先生之说，“大致是追随塞人西移的路线。周穆王自宗周（洛阳）启程后北渡黄河，出关陞（雁门关）到河套以北，然后西向，经乐都、积石，由柴达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往前直抵春山、珠泽、昆仑之丘，”^①见西王母。“昆仑之丘”即为《穆天子传》中的“昆仑丘”。马雍、王炳华、余太山诸先生认为，“昆仑丘”即是今天的阿尔泰山。^②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巡每至一处即以黄金、银婴、贝带、丝绸、朱丹等馈赠各地部落首领，各部落首领亦回赠良马、牛、羊、良犬、麴酒等物。由于西王母的盛情接待，穆王曾“乐而忘归”，最后顺锡尔河而返，向北两千里至吉尔吉斯大草原，取道伊犁河经天山北路东归。周穆王向西巡狩，密切了周朝与中亚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与此同时，其西巡路线中已显露出陆上丝绸之路的端倪。

商周之际，中国与朝鲜就有了往来。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③箕子，名胥余，殷朝宗室，纣王之叔父，因屡谏纣王不听，乃被发佯狂为奴。周武王伐纣灭殷后，即拜访箕子，向箕子请教常伦法理。因不忍见殷亡为亡国民，箕子遂率族众东迁至朝鲜半岛北部古朝鲜之地，建立了箕氏朝鲜。箕子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从而往。教以诗书，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6页。

② 参见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载于《中亚学刊》第三期，中华书局1990年。

③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

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①箕子在古朝鲜立国时，“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所以，朝鲜最古的史籍《三国史记》将箕氏朝鲜列为第一王朝。

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返回故国一次，途经殷墟，见殷朝宫室残破坍塌，禾黍丛生，伤感不已，遂赋诗咏叹：“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②殷商遗民闻之，皆恸哭不已。史籍这一载述表明，箕氏朝鲜与周朝之间仍有交往与联系。

周武王克殷建政后，周人承袭，发展了夏、商两朝的天下观，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华夷观。所谓“华夷观”，是“华夏”与“夷狄”在文化上优劣有别，华尊夷卑的观念。故《国语·周语中》曰：“夫戎狄，冒没轻谗，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周人把“夷狄”斥为禽兽，是教化与施恩威的对象。“华夷观”形成后，便对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命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而其华夏文化至尊无上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从而制约了中国对外来文明优秀成果的积极摄取。

二 先秦时期中外交通寻踪

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弑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摧毁了宗周，武王克商创建的西周遂告覆灭。面对游牧民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即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邑，周天子权威失坠，群雄崛起，云合雾集，竞相争霸，中国社会进入了天翻地覆的动荡时代。

在争霸兼并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齐、晋、秦诸雄相继掀起了尊王

^① 《海东绎史》转引自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② 《史记·宋微子世家》卷六十八。

攘夷运动，欲图借此扩张势力，成就霸业。秦穆公获深谙西戎的由余襄助，秦国向西“开发两千里，遂霸西戎”，^①沟通了秦与河西走廊的交通。

由于秦国持续向西扩张，亚欧大草原，波澜骤起，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在秦国的侵逼下，栖息于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乌孙等游牧部落西迁至伊犁河与楚河流域，一直活跃于这一地区的斯基泰人被迫离开故土，向西移徙。原来居于黑海之滨的西米里安人，无力阻遏斯基泰人的大举西迁，不得不向西逃遁。斯基泰人移徙至黑海西北岸后，曾南下入侵西亚，在斯基泰人的打击下，曾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迅速走向衰亡。

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殖民者就到达了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斯基泰人抵达黑海西北岸后，便与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他们经常往返于阿尔泰、准噶尔一带贩运黄金，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丝绸成为古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希腊巴特农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披上了细薄透明的丝料长衫，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人物，也身着轻薄如蝉翼的衣衫。斯基泰人跃马驰骋的吉尔吉斯草原和罗斯草原，成为了丝绸之路最早通过之地。早在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就开辟了黑海、里海、咸海以北和天山以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通道，成为欧亚北部最早的草原之路，亦称“斯基泰贸易之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曾对活跃于这条草原之路上的各个游牧民族作了载述。近世以来，在阿尔泰地区考古发掘中，不仅出土了产于当时中国的绣有凤凰图案的丝绸，而且亦有来自西亚的羊毛绒毯和羊毛织物等。^② 这些考古学的成果表明，当时阿尔泰地区已成为联结中国内地与草原之路的要冲。这条斯基泰贸易之路在先秦时期的中外交往中发挥了作用。

秦国独霸西戎，各游牧民族相继迁徙。公元前612年，曾因斯基

^① 《史记·秦本纪》卷三。

^② 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泰人南下遭到严重削弱的亚述帝国被米底人和新巴比伦王国所摧毁。公元前6世纪,崛起于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波斯人,在阿黑门尼德族酋首居鲁士的率领下,相继征服了米底王国、吕底亚和新巴比伦王国。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居鲁士征服了整个西亚地区,建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之子冈比斯即位后,又一再对东方斯基泰人部落进行征战,帝国的疆域扩展至中亚的锡尔河流域,从而直接与我国的新疆地区相邻。

大流士一世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便于军队的调动与政令下达的迅捷,在赫梯和亚述旧驿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许多驿道,帝国的“御道”始于吕底亚,穿越小亚细亚,渡过幼发拉底河直抵巴比伦。从巴比伦又有两条通往帝国的驿道,一条是通往帝国的都城苏萨,遂至国王的离宫萨尔伽底与波斯波里;另一条则由美索不达米亚至米底旧都爱克巴坦那,遂抵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及印度河流域的各个邦。此外,另有一条纵贯南北的驿道,其穿越西亚,经叙利亚、腓尼基的商业城市直抵黑海和高加索各地区。^①波斯帝国境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促进了东西方各族人民的往来与文化交流。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拉近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文明之间的距离。

然而,公元前331年,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波斯帝国,进而远征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其兵锋直达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阐,并且进入五河流域,几乎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诞生了。大批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前往东方,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毗邻的中亚地区,为嗣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亚历山大在埃及、西亚和中亚各地修建了众多的亚历山大里亚新城,日后,这些新城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在其病故后迅速瓦解,分裂成几个独立王国。其中,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国(我国史籍称为条支),其都城安条克城成为了印度、中国与地中海区域商业往来的必经之地,地中海东岸的塞

^① 参见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琉亚城则是安条克的商港,此后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托勒密王朝,为亚历山大另一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及周边地区所建立。公元前30年,该王朝被罗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然而,正是在托勒密王朝与罗马人统治时代,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希腊人和罗马人谙熟航海与贸易,他们抵达埃及后,埃及便成为了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从地中海直接驶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征发民工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至托勒密王朝末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达到了二十艘。^①公元初年,罗马人普遍掌握和利用印度洋信风航行,从而打破了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大为改观。于是,每年从埃及启航驶向印度洋的商船总数剧增至一百二十艘。^②是时,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崛起,并以优良的海港,成为埃及惟一的海上贸易地,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具有世界地位的商业、文化中心。

埃及与亚历山大城的发展和繁荣,令古代世界瞩目,从而为日后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日趋强盛。公元前278年,秦国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秦国削平群雄,吞灭六国,宅有天下。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威震宇内。然而,秦王朝国祚不长,“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西汉帝国,经过“与民休息”和“文景之治”,日益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兴盛和国力的强盛,西汉王朝对外交流的愿望与日俱增。正是由于秦汉两朝的强盛与繁荣,从而为古代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edited by J. D. Fage, 1979. P193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edited by J. D. Fage, 1979. P193

三 远古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丝绸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与创造。我国蚕丝生产,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就有黄帝妃子嫫祖教民养蚕织衣的传说。殷商时期,我国的丝织业生产就已普遍开展起来。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表面,经常粘附有丝绸残片或渗透的布纹痕迹。出土的丝绸残片,有平纹、有花纹,平纹组织的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厘米有三十至五十根。从花纹组织来看,殷商时不仅能织造各类平纹组织的绢帛,而且采用了提花技术织成菱形花纹的暗花绸,以及绚丽的刺绣品。丝织物已成为当时贵族主要的衣着原料。考古资料表明,殷商丝织技术日趋成熟。

迨至西周,养蚕织造丝绸的技术继续发展,出现了饲养家蚕的蚕室,以及蚕架、蚕箔等设备,“治蚕茧”成为当时妇女应学习的女事。为倡行蚕丝生产,王后、诸侯夫人亦“亲蚕事”以为示范。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时养蚕织造丝绸的情况:“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①西周少女采摘桑叶,修整桑枝,悉心养蚕,缫丝染色,为公子裳的过程,跃然纸上。而“为公子裳”表明,丝绸已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要衣料。为此,西周政府专置典丝官,专事生丝的验收、储藏以及分配给工匠织造等事项。^②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西周后期出现了“锦”,这是一种复杂技术织成的比较名贵的丝织品。丝绸还成为当时民间贸易活动中的交换媒介,故《诗经》

① 《诗经·幽风·七月》。

② 《周礼·天官冢宰》。